

方志文化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的作用

——以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修志为例*

温益群

提 要：在国家典籍平台上，通过对地方志书和地方志编纂活动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若干文化现象的呈现，可以考察方志文化在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中的作用、边境地区的地方志书对于民族国家的贡献，以及地方志编纂活动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功能。正是方志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我们应该给边疆民族地方修志活动以特别的关注和考虑。

关键词：方志文化 边境民族 国家典籍 国家认同

关于“文化”，中外学者的定义和解释众多，至今莫衷一是，这表明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文化。方志文化，道理亦然。笔者认为，“方志文化”是指地方志及其编纂活动与社会发展各事项之间在观念意识层面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以及所形成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总和。

云南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自治州县最多的边疆省份。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云南全省总人口4596.6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433.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3.37%；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民族有25个^①。在这25个世居少数民族中，有15个民族为云南省特有。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边境线长达4061公里，占我国陆地边境线的1/5，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25个世居民族，其中16个民族跨境而居，占全国跨境民族总数的1/2，这些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化同源，语言相通，习俗相近。云南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边境25个县市中，22个为民族自治县或民族自治州中的县份。云南的这些特点，使得云南边疆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修志情况，为方志文化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样本。以民国时期云南方志的纂修来看，从1912年到1949年，据不完全统计，累计纂修成省志2种、县市志71种，成为中华民族地方文献宝库中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②。

不过，如果从地域和民族的角度考察这些志书，我们会发现，在旧中国的修志格局中，云南边境少数民族是“缺席”的，在中华民族编修地方志这一传统文化活动中，云南25个地处边境县市（其中22个是民族自治县）大多没有自己的县志。这些边疆县中，虽然有些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但多半是一些片段的文字，分散在不同的书籍之中；作为全面记载当地历史与现状的志书，始终是个空白。对此情况，人们唏嘘不已。《沧源佤族自治县志》直

* 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云南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内地修志活动历史悠久，成果颇丰；而边境各县或各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在历史上都没有修过志。本文主要以云南25个边境县作为考察对象，由于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与历史上传统志书在编纂目的和宗旨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便于讨论，文章主要对新编地方志活动进行分析研究。

① 《云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云南省统计局，2011年5月9日。

② 宋永平：《解放前云南方志的纂修》，《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言：“沧源自古未曾修志，因此，对古今沧源人来说，修志是一个陌生的名词。”^①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县志》主编陈江感叹道：“就编修地方志而论，（瑞丽）和内地州县相比，差之万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典籍之沦淹、历史的变迁，给瑞丽的历史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满目青山夕照明，尚缺史志载春秋。”^② 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民族在以国家名义倡导和组织的社会活动中，能否具有与其他民族平等的身份。中华民族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方志文化不应该只是汉族的和内地的方志文化。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在方志文化中缺席和被边缘化的历史，其实也反映出封建时代边境各少数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

从历史来看，由于各种原因，在以中原内地和汉族为主体的传统方志文化中，云南一些边境少数民族缺席，这既是各具体少数民族的文化损失，也是中华民族方志文化的历史遗憾。中原文明之外的文明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呈现和记载，中华文明的内涵将会大大缩小。边境少数民族历史在没有进入国家历史典籍的情况下，它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应该通过作为国家典籍的地方志书，把边疆（边境）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边疆的历史，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以及各民族丰富多样的社会变迁过程、观念意识形态、民间风情习俗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记载和呈现，以此来体现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尊重；同时也使中华民族方志文化的内涵和形式更加完善且丰富多样。从当前现实来看，地处边疆、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省，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典型。云南长期以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形成了世人瞩目的“云南现象”和各民族团结进步、繁荣稳定边疆的“云南经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调整，东南亚、南亚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了相应变化。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在奉行和平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时，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袭，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尤为重要。地方志历来讲究经世致用，方志文化应当也可以为国家的稳定战略作出自己特别的贡献。

一 边境民族方志文化对于国家历史的补充和完善

民族方志使作为国家典籍的地方志中有了少数民族的话语和笔迹。正因为地方志编纂对于边境少数民族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云南省的自治州、自治县对于修志都特别重视，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强调和保障，绝大多数自治州和自治县都专门把地方志编修作为一项条款，写入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中。少数民族在国家文化活动中的参与，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权利的行使。这种参与，保证了在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国家历史典籍中，有少数民族自己的话语和笔迹，有56个民族和各民族地区的历史呈现。

民族方志使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有了边境少数民族的“具体添加”。边疆志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国史宏大叙事的框架，来收纳当地看似琐细却实为珍贵的“砖瓦木石”。国史（包括省志），往往避免不了概要的背景交代和抽象的定性阐述；而地方上的一些事项传说和文字记述，则关注于史料的当下记录。前者虽宏大壮观，但毕竟有缺少细节和不见纤毫之嫌；后者虽然具有实在的“砖瓦木石”，但不足以建构有历史存在意义的典籍殿堂。而边疆民族的县志，刚好

^① 沧源佤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沧源佤族自治县志》，第102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版本下同。

^② 瑞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瑞丽市志》，第79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版本下同。

把二者有机结合。例如,在首轮新编《云南省志·卫生志》中,为了突出云南边疆民族的地方特点,专门设少数民族医学章,记述云南少数民族医学的发展历史和总体面貌^①,是整个《云南省志·卫生志》最成功的篇章之一。然而,在一部近百万字的省志卫生志中,需要记载的事项太多,读者在篇幅为2万字的少数民族医学章中,仅可观其概貌而难见其具体模样。相较而言,《瑞丽市志》卫生章则更为翔实地记载世居在该县境内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的医药知识,还记载了若干位有名有姓的从医者和这些民族的中草药药方(具体到对症、药名、用量、制作,乃至禁忌等内容)^②。云南边境民族县的志书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它们在志书形式的国家典籍里,对于省级志书的一些宏观记载和重要论断作了印证,以具体的史实资料丰富国史或省级志书叙事框架的血肉。

民族方志以客观的“地方故事”留下确凿的“历史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共有家园。国界在云南边疆并不是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而是与跨境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在20世纪60年代中缅勘界以前,边界两侧各族人民按传统在部落村寨领地内自由开垦土地,各部落村寨之间未明确划定领地四至界线,这种情况在云南边境司空见惯。中缅两国划定边界以后,部落村寨之间的关系成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过耕”等问题随之出现。云南边境地方的县志用非常具体的例子,记载了中国各跨境民族对自己家园和国家领土的守卫和维护。例如《沧源佤族自治县志》的“界线界桩维护”中有这样的记载:1984年5—6月的中缅边界联合检查中“发现159至160号界桩之间的巧克河上形成一小岛,面积达0.007平方公里(10.2亩),该岛属中国领土,却为缅甸边民田老二过耕;该岛南面河道原状改变,河水全部流入中国一侧,系缅甸奥利亚边民修拦水坝3道致使泥沙淤积、河道堵塞造成。发现后,由(中国)当地生产队出面劝缅方边民放弃过耕,并组织中方边民开挖原河口,后恢复河道原状”^③。这样的内容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志》和其他边境县志中多有所见。此类记载使我们联想到,远在清代,台湾府的方志文献即明确将钓鱼岛列入版图,记录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中国册封史的出使记录及其他有关琉球的历史材料。这些都成为人们今天考证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确定其主权的历史证据。补史之阙、详史之略,本来就是地方志对于国史的意义。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这类边疆群众生活中的“小事”,被客观详实地记录到具有国家历史典籍意义的志书中,成为确凿的历史证据,既是两国边民和谐相处的依据,也是两国界线的明晰和宣布,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民族方志以载入典籍的方式体现国家对未识别民族(人)的承认和尊重。史遍天下之大,志则录一邑之小。在《云南省志·民族志》中,对于云南边疆的“未识别民族”,只介绍了生活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和景洪市的克木人、生活在文山州马关县的拉基人、生活在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芒人^④。而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腊县志》民族卷的第六章未识别族群和外来民族中,除了记载克木人之外,还以相当的篇幅记载生活在勐腊县的“补过人”和“排角人”的情况,体现了我们国家不论族群大小和人口多少,一律平等的民族原则,也体现了国家对于人口少(小)的民族(或“人”种)历史的承认和尊重。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国家对于边境少数民族的尊重,正是通过包括地方志编纂在内的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国家行为来实施和体现

①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卫生志》,第380~39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瑞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瑞丽市志》,第612页。

③ 沧源佤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沧源佤族自治县志》,第676页。

④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民族志》,第797~80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的。对“补过人”“排角人”是这样，对其他少数民族更是这样。这样的记载对于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意义，必然是积极和向上的。

二 地方志及其编纂活动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功能

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少数民族成员对自己与所属民族的同一性关系的认定和确认，也是对自己所属“民族关系”的确认，它包含人们的意识、感情、认知以及和这个民族相一致的思维方式等复杂的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因素^①。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其本质是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与国家共同体同一性关系的确认，表现为在心理上具有国家归属感、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在行动上能够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需要，维护国家利益^②。在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对自己所属民族和所属国家的“确认”“认同”过程中，地方志发挥了一种独特而微妙的文化功能。

地方志以国家历史典籍的形式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自然融合。“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③ 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志，是国家以历史典籍的形式，对少数民族的一种尊重，也是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的一种形式。在国家组织的地方志编纂这个舞台上，让少数民族出场，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与封建时代志书编纂的一大区别。正如前述，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但是以往在这个传统文化活动的舞台上，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多半是缺席的，国家对他们的态度一般是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形成了方志文化上国家与边疆民族之间的疏离；在地方志的诸多文化功能中，也基本没有专门考虑和特别赋予其“培育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功能。云南边境民族的历史文化，多半还只是以“民族的历史”和“地方的文化”形式存在，而地域文化往往只有在得到国家的描述后才能成为正史。从20世纪开始的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要求各省、市、县都必须编纂地方志书，边境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因此得以载入具有国家典籍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这种全国统一、自上而下、不断推进的国家行动，在本质上有着“将多元民族文化融和到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之中的结果，从而具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意义”^④。

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通过地方志得到增强。民族自豪感的获得和增强，并不是一句空话，它必须具有各种形式的实质性支撑，而将自己的完整历史载入国家历史典籍，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20世纪40年代，云南边境的许多民族地区，都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处于刻木、结绳记事，以物传情时代^⑤。有少数在民国年间编过县志初稿（例如勐腊县、江城、泸水等），虽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但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内容单薄、篇幅极小，内容残缺不全，且没有正式出版印行，仅以抄本形式存于云南省图书馆等处，一般不容易看到。许多民族没有文字，官府文书资料残卷碎纸字迹不清，在相关的其他典籍中虽有一点记录，但资料甚微。许多史实，既无文字记录又无证据可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发展发生历史性跳跃，但是很多历史事项因边疆的种种特殊原因而没有完整的资料记载。一个没有自己完整正式的历史典籍的民族，在说到民族自豪感的时候，多少是有些底气不足

① 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② 马丽萍、桂皎：《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④ 马翀炜：《世界遗产与民族国家认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第42卷第4期。

⑤ 西盟佤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盟佤族自治县志》，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版本下同。

的。在社会主义首轮新编方志中，这些历史上没有志书的边境民族县，以特别的热情和积极的投入，与中原县和内地县一样，以丰富全面的门类、珍贵翔实的史实，正式编纂出版了自己的志书。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志书出版问世，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意义，也许比中原内地汉族地区更重大、更特别。例如《西盟佤族自治县志》的编纂出版，被认为是“改变了千百年来靠口传耳听民族历史的单一方式，挽救了许多即将失传的文化遗产”^①。《沧源佤族自治县志》编成之后，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名为之作序，把这部志书称为“千年佤山第一志”。当我们跟着志书的记载，了解了这些边境民族的社会发展历史之后，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这类评价文字所负载着的民族情感，非一般书籍出版时的应景之语可比。从方志文化的角度来看，通过县志编写这一国家统一行动，收集边境民族地区分散的和碎片化的资料，以志书的形式还原和重现历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体系，以完整的民族形象和系统的地方知识跻身于作为国家历史典籍的地方志中。边疆各民族文化的拥有者，通过地方志得到国家典籍的承认和重视；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也通过地方志有了依托和增强。

“国界”“外事”等特殊内容以客观事实和地理空间培育着国家认同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是指少数民族成员对自己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心理过程，其本质是少数民族成员对自己与国家共同体同一性关系的确认。“国界”“外事”等，是云南边境民族县志书中记载的重要内容。例如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志》中，专门将“外事”列为一编，其中基于真实客观的历史资料，记载了沧源县边界线的情况，翔实记述了中英勘界、中缅勘界的情况，用科学专业的术语表述了界线走向、界桩的具体情况。虽然这些事项在相关部门均有正式的文书档案，但是普通老百姓一般都没有途径和机会看到这些文献，这些重要的文献更多只有档案收藏的意义，而没有发挥广而告之和宣传教育的价值。但是，在印刷数千册并公开出版发行的志书中，公开记录这些内容，将边界的情况向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社会人群作了宣布，使“国家”的地理界线，经过国家典籍的宣布而广为人知。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境线上两国边民因不知“界线”而过耕、过牧、砍伐所发生的误会和纠纷，保证边境稳定；另一方面，也使边境少数民族增强自己的国界意识，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明晰和强化自己所属国家的概念，这对于他们的国家认同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地方志编纂活动中的“内化”与“感染”。云南在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中，一直秉持“各民族自治地方，应吸收本民族干部参加，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专业修志人员”^②的理念。参与边境地方志编纂的人士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是在党和国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民族精英，然后在国家修志机构中担任地方史官的角色，长期的教育与熏陶使他们具有国家认同的思想，他们接受并奉行国家传统地方志的编纂理念和原则。同时在编纂活动中，编者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更加接受代表国家意志的一系列文化思想，进而把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念内化成自己思想意识的一部分。云南各边境县参与过地方志编纂的民族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后来都被调任地方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这一批少数民族精英，在编纂地方志过程中具有领会与阐释的双重身份，在修志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国家认同，并通过志书编纂乃至日常言行，影响身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在今后边疆的民族团结和谐中，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中扮演重要且特殊的角色。

① 西盟佤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盟佤族自治县志》，第1页。

②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九条。

三 方志文化应该给边疆民族地区修志活动以“强调性”关注和考虑

应该正视的现象：地方志对边疆民族关注不足。鉴于方志文化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所具有的特殊、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条例》之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关注和考虑有所欠缺。《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一条，阐述制定条例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所说的“中华民族”似乎只是一个概念性的集合名词，通篇没有提到“民族”问题。即使第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此条规定虽然点出了若干重要的方面，却没有提及请民族问题专家参与审查验收，没有提及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内容也是审查的重点。虽然在编纂工作中，相关省区的地方志书中列有民族志，编写中对于民族志编纂也有所考虑和研究，但是此民族志与方志文化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以及民族地区的修志问题，与方志文化和边疆民族相关问题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并不完全等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大规模文化行动中，对于少数民族修志问题缺少应有的考虑和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历史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值得总结并继承。回顾新编地方志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对于民族问题的考虑和规定是正确和有效的。例如，第三条规定地方志要“准确地记录并积极发扬当地各族人民爱国爱乡、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第五条规定“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新方志应充分反映多民族的特点，应当体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民族自治地方的新方志，可以同时用汉文和本民族文字出版。各地编纂新方志时，对于散居全国的少数民族，都应给予相应的反映”。第十九条强调“各民族自治地方，应吸收本民族干部参加，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专业修志人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云南边疆（边境）民族地区的地方志编纂工作，遵循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结合云南边疆（边境）民族地区的实际，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相关要求编纂，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做法和经验应该得到总结和继承。

应针对边疆民族的特殊性给予特别考虑。正如前述，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但传统的地方志是以中原汉族和内地民族为主要行为者的一种文化活动。一些边境民族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原因和旧中国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一般比较落后，他们在以往的修志活动中是缺席和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变，不能仅仅限于边境民族县编出一本新县志；从方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和解决。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重大议题之一。这样的形势面前，方志文化对于地方志及其编纂活动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各种事项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应该有所研究和回应。国家相关法规和相关部门、地方志编纂活动的执行者，应该给边疆民族地方修志活动以“强调性”关注和考虑。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近华浦路春苑小区春明星28号省地方志办公室 邮编：650118）

本文责编：詹利萍

China Local Records

No. 12, 2015

Local Records and the Nurtur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 *Wen Kundou, Zhang Jing*(4)

The historical existence of culture is the result of local records 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ereas the regional existence of culture is the significance of local records as a regional culture concept in 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record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from the angl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based on which to discuss the effective paths in local records 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e Role of Local Records Culture in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Frontier Stability-Taking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n Yunnan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as Example

..... *Wen Yiqun*(7)

On the platform of national classics and references, through various cultural phenomena of local records and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ctivities in Yunnan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local records culture in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frontier stability, the contribution of local records in the frontier region to our nation and country, and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ctivities i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untry identity.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we realize that special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given to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ctivities in the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Preface to the Punctuated and Emendated Edition of the Ming Hongwu Suzhoufu Records

Cang Xiuliang(13)

A Scroll of City Panorama-On Reading Ningbo City Haishu District Records

..... *Yan Yuehu*(16)

Local Records Cultur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Tribute to Our Forefathers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Local Records Cause amid the Flames of War and in Deprivation and Hardship due to the War.

Mei Sen(19)

Local records are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art of anti-war culture show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long and arduous struggle,